

两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的一些学生和朋友经常对我说：“杨向老，有人问我：‘您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写了不少有关自然科学的论文，真是文理兼通。他们觉得您一定是书香门第，学术渊源有自。’听了这样的话，我不禁付之一笑。学界朋友的爱护和关心，使我十分感谢。但我要说，上边的话都是不对的。首先，我是一个愚钝如椎之人，虽写了一些史学和物理的论文，但也大多平庸无为，极少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至于说到我的‘家学渊源’那就更为不对了。

我祖籍在河北省丰润县乡村。从我祖父这一辈上溯五代都是贫农，家里穷得很。从我高祖到我父亲，全是文盲。高祖名杨岐山，他活了将近 100 岁，身体很好。听村里人说：高祖每天晨起，就提着鸟笼去遛鸟。曾祖名杨瑞丰，我幼年时他还活着，是个驼背，常背着我玩耍。年轻时，靠给人当长工过活，一个字也不识。我祖父叫杨玉生，是一个烧酒的工人。我祖母家里更穷，一直靠讨饭为生。我祖父要结婚时，家里没有一个钱。当时是制钱，他需要四吊钱，四吊钱相当于现在四角钱。他向本家的一个堂叔去借，这个堂叔就是我的堂曾祖父，他是个小炉匠，生活还过得去，但也不

想借给。他问我祖父用什么还，最后也还是借给了，就这样四吊钱就结了婚。到我小时，我祖母的娘家还特别穷。有一次她叫我：“大梁，我的小名）跟我串亲戚去吧。”我当时很高兴，因为串亲戚可以吃好东西。他领我回了她娘家，离我们村只有三里路，她们家是靠给一个大地主看坟地生活，家里破破烂烂，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祖母就带我回来了。

我祖父兄弟二人，都苦得很。叔祖父是个长工，力气很大，村里传说他力大无穷，简直和神话一般。到我父亲结婚时，家境已是中农，到他们这一辈时亲戚也全是中农。我母周氏，聪明伶俐，且自幼生长于乡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品德。由于她和我祖父、父亲三个人能干，日夜不闲，里外操持，又买了一些地，成为富农。我出生时，家里已是小地主。因父辈辛劳一生，且都是文盲，因此他们对供我读书不太支持。我在家一直玩到 7 岁，父亲才让我上学。我上学后出了许多笑话。记得上小学一年级时，一次上写字课，我由于年纪小，手握不住大羊毫笔，一不小心，身上、脸上全都是墨。晚上放学回家时，一进大门口，迎面碰上一位伯父。他见我这个模样，脸上嘿嘿一笑，嘴里露出“夸奖”的话：“这个学生的字写得太好了！”我听后非常高兴，乐颠颠地回到了家。一进门，就把伯父“夸奖”的话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妈妈。妈妈一脸狐疑，不解地问：“他看见你写的字了？”我告诉妈妈说：“没有啊。”这时妈妈才笑着说：“那是笑你一身墨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伯父并不是在夸奖我，而是在嘲笑我。还有一次学画画，老师叫我们画一个圆

圈 我怎么也画不圆。拿回家去 叫爸爸画。爸爸说 他是文盲，不会画圆圈，我急得直掉泪。我自幼还养成一个固执而保守的毛病，自己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从小就喜欢在头上扎个小辫，辫子很细，上面又打个红头绳，觉得漂亮极了。一直到上小学时，还不愿意剪掉。当时全校百余名学生，就我一个人留小辫，老师三番两次劝说，我也不听。二年级时 老师又劝我 还是不听。后来 有一个老师想出了一个妙法 对我说：“杨向奎 你不是喜欢摔跤么 你摔跤时，人家一拽你的辫子，你肯定要摔倒的，快把辫子剪掉吧！”这样 我才把辫子剪掉。

当时的小学分两段，前四年是初小，后三年是高小。上高小时要到外地，一年要花 30 块钱。按说 地主家庭经济上应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的祖父很不愿意让我去上学。这是因为他固然是一个文盲，根本不喜欢读书，更主要的是他生性偏爱，对我父亲这一支根本就不喜欢。所以，当我要去外地读书时，他满脸不高兴。但我执意要去，母亲也非常支持我，她认为孩子就应该读书，将来才有出息。由于母亲的全力支持，我还是考学去了，并考了第一名。榜发下来后 全家都很高兴 唯独祖父一脸阴云。上学了 要交 5 块钱的饭费、学费。我向他要时，他只给了 4 块钱，还说钥匙丢了 打不开柜子 那一块钱拿不出来。我急得直哭 父亲、母亲也很着急，可祖父就是不肯把那一块钱拿出来。这时，母亲就和他吵，说他太偏向叔叔那一支了，并质问他：“你儿子（我叔叔）怎么就能大学毕业呢？”好不容易高小毕业了，我又考上了中学，但祖父更加反对了，这次说什么也不

让我上学了。母亲虽然支持我，但在当时的封建礼教束缚下，还是不得不屈从了祖父。母亲对我说：“我们不再念书了，虽然考上了中学，你爷爷不给钱，没法生这个气，不必念了。”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此也无能为力。正好，我有一位表弟，因为家里穷，在天津宫北白衣庵出家当了和尚。当和尚神通广大，母亲对我说：“跟你表弟到天津去也许能找到事情做。”这样，我就随表弟到他们的庙内住下去，但找不到任何事情做。一个孩童当时只能做学徒，但学徒也找不到机会。此时我几乎出家当了和尚。在天津呆了两三个月，整天无事可做，把钱也花完了，困在那里回不了家。后来，父亲把我接回家，送到县立中学，这回总算又念上了书。上中学二年级时，我的祖父去世了，他永远不必开柜掏钱了。当祖父去世时，我心里很难过，哭了很多次，心里想：“你多活几年多好，一定能看到我读书有所成就；我不是一个无端浪费钱财的人，你花几个钱供我读书是不会赔本的，我会为你争光的。”当然，我也争不了什么光，只是这样想想罢了。上小学时，我年年考第一，大学也是头等，惟独中学成绩不理想。上中学的头两年，因为祖父和母亲吵得很凶，祖父不给钱，心里别扭，没心思读书，后两年祖父去世了，父亲当家，一直供我上了大学，学习成绩也就上去了。

在中学读书，有两位老师的话影响了我。虽然说，这些话不是推动我研究学问的动力，但一直影响着我，而且至今未忘。当时，我们中学教务主任姓王，我忘了他的名字，只称他王先生吧。他是保定高师毕业，是一位很有学问的

人。有一次他给我们做报告，当谈到我国经学问题时，他说：“在经学问题上，今文学派说《左传》是一部假书。”当时我不懂什么今文、古文问题，听说《左传》是一部假书，这真使我惊讶不已。我没有读过多少古书，只是在放假期间，我的一位族伯教过我一部《左传》。我就念过一部《左传》，而它却是一部假书，我心里很放不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假，怎么假法，不敢去问他，只是存在心里。当时，还有一位老师王硕儒先生，他是乐亭人，是李大钊先烈的同乡，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教我们物理，有一次他说：“我懂得‘相对论’，那是四维。”什么是“四维”？读过物理，知道三维。四维，那一维是什么？没有问，也不敢问，但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上述两位先生的话，可能只是随便一说，他们绝没有想到会影响一个不出色的学生的一生。我说“影响”，是我总未忘这两句话，有机会就想解开这两个谜。

进北京大学后，我是在顾颉刚先生的影响下入了历史系的。顾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经学家、民俗学家和文学家。我们环顾近现代的学术大师群，像顾先生这样全面的似乎没有。顾先生当时虽只 30 岁出头，但已是名震全国的古史辨派运动领袖。由于我是一直在顾先生的教导下成长的，此后学界中的同仁也把我当作“古史辨学派”或“顾颉刚学派”中的一员；我的另一位老师傅斯年先生由于和顾先生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两人各走各的路，傅先生也总认为我是“顾派”。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诚然，我和顾先生在学术上是有渊源关系的。例如，在炎帝一系的探讨上即可看出这一点。我们中华民族常自称是炎黄子孙，久而久之，这“炎”字成了具文，我们似乎已经数典忘祖！其实，这种局面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定型了。他根据一些世谱、牒记、传说，在《史记》中首立《五帝本纪》，断自黄帝，本来来源各异的各民族从此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黄帝一系之下。诚如《庄子·盗跖》所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顾颉刚先生在其名作《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曾列过一个“夏以前的帝王表”，并说：“我们看了这个表，可以知道，在许多古史系统中，只有黄帝、尧、舜是不缺席的。再有二人就很难定。一派说这二人是颡项、炎帝，别一派则说是伏羲、神农。我们看了这个表，又可知道，炎帝这人确是常给人家称道的，但除了《封禅书》以外却没有把他放入古史系统了。所以然之故，只因为以前说作他的子孙的国家，如申、吕，如齐、许，都早亡了，没有人替他争位了。”顾颉刚先生是探讨炎帝文明的第一人，其开创之作，1937年发表在《禹贡》半月刊，后来收入《古史辨》第七卷下册的《九州之戎与戎禹》。先生的思路是：九州为“中国”的代称，夏人的祖先禹与九州有极深的关系，而九州最初是戎族的聚居地，故禹又称“戎禹”，那么，向来被视为华文化（黄帝文明）的实际上多为戎文化（炎帝文明）的创造。由戎居之九州，演化而为天下之代称之九州，更演化而为尧之十二州；由戎之先人所居之四岳，演化而为平分四方之四岳，更演化而为汉武帝之五岳；由戎之宗神禹，演化而为三代之首君，州与岳随民族之疆域之扩大而扩大，“禹

迹”又随州与岳之扩大而扩大：此皆向所视为纯粹之华文化者，而一经探讨，乃胥出于戎文化。且姬、姜者向所视为华族中心者也，禹、稷、伯夷者，向所视为创造华族文化者也，今日探讨之结果乃无一不出于戎，是则古代戎族文化固自有其粲然可观者在，岂得牢守春秋时人之成见，蔑视其人为颛蒙寿昧之流乎？夫戎与华本出一家，以其握有中原之政权与否乃析分为二，秦汉以来，此界限早泯矣，凡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中矣。不幸春秋时人之言垂为经典，后学承风，长施鄙薄，遂使古史真相沉霾百世。爰就九州之戎一事寻索禹之来源，深愿后之人考论华戎毋再牵缠于不平等之眼光也。

顾先生最早注意远古的民族分合，并始终坚持炎、黄不同族，坚持炎是炎，黄是黄，大方向正确。但许多历史学家不是以民族的特征，而是以地域来划分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徐旭生先生《中国古书的传说时代》一书。徐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我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顾先生的观点，认为姬、姜原不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各有来源，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集团，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

表了华夏集团。我还说，徐旭生先生在谈及华夏集团时，最初只是把黄帝与姬氏联系起来，关于夏则另立章节，从洪水开始，讲到大禹治水以及其他发明与发现，没有谈夏为什么属于华夏。它与黄帝的关系，与姬周的关系，甚而与姜氏的关系，都未谈起。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捏合成一个集团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这样我们才能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就黄帝与姬周的关系说，除姬姓外，我认为在图腾崇拜上更可以说明问题。那时的图腾，犹如现在的国旗，炎帝一系是熊，而黄帝一系是龙，炎黄融合以后，出现了《天问》中“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有趣场面。黄帝与夏的关系，夏周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可以从图腾中得到解答。《国语·周语下》说：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尝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比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依也。

郭沫若先生对“我姬氏出自天鼋”的解释是：“天鼋即轩辕也。”我个人认为这的确是最好的解释。出自天鼋即出自轩辕，而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而黄帝之称作“轩辕”（天鼋）实在是水族动物龟蛇的崇拜。夏代图腾是玄鼋，天、元古音相通。我在金文中认出了这从来没有认出的字。

我在《论‘以社以方’》(发表于《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上)一文中,专门讲炎帝一系文化。我从“方社”的祭典中寻觅申、吕的文化渊源,申吕文化即属于炎帝一支,炎帝姜姓,申、吕是其后裔,均称过王,申与楚本为一族,申先楚而称王,后申衰而楚继之称王,逐渐申楚合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实为楚之核心。

我在《蚩尤即皋陶考》(发表于《张维华纪念文集》齐鲁书社1998年9月版)一文中,依据历史记载,并结合训诂考证,认为皋陶属炎帝族系,即是与黄帝战于涿鹿的蚩尤;皋陶亦名咎繇,咎繇古代读音完全同于蚩尤,故皋陶即咎繇,亦即蚩尤。退一步说,咎繇与皋陶即使不是一人,亦出于同族。蚩尤造兵,而皋陶制刑,刑出于兵,古兵刑为一,所以蚩尤与皋陶都是我国古代制作刑法的先人。

在炎黄两系的来源及炎帝文明的探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问题的见解)上,我的确和顾颉刚先生有着学术上的渊源,但我决不是“古史辨派”。前面已经说过,顾颉刚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代表,我过去就是受顾先生的影响才学历史的。当时我非常相信这种学术,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就不相信了,我认为这是今文学派的偏见。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但今文经学派后来演变成疑古派,他们怀疑虞,怀疑夏,对商、周的许多历史也持怀疑态度。这就未免太过火了,玉石俱焚,这样一来,硬把中国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变成两三千年的历史,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没有根据

的。无论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这种理论都是难以成立的。我曾经写过一篇《论古史辨派》（后收入《中国古代史论》）的文章，对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的古史学说作了些评论。童先生是顾先生的得意弟子，著名的疑古健将。他和我是老友，我们曾一起合作写书或文章。但我们两人在许多古史问题上往往意见相左，发生尖锐、激烈的争论。双方写文章争论时，童先生署名“童疑”，而我则署名“杨守”；“守”即保守。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童书业这几位先生怀疑《左传》出于刘歆的伪造（很巧，崔适与钱玄同、钱玄同与顾颉刚、顾颉刚与童书业都是师生关系）。有一次章太炎对他的弟子钱玄同说：“你这些话都是从姓崔的那里来的，是不值一辩的。”章先生竟要刻一枚图章，上书“刘歆私淑弟子”，虽然没有刻成，但从此可以看出，今古文之争到了多么激烈的程度。

历史如果没有一个载体，那就不成为历史了。同样，如果记载中国历史的事实和典籍有那么多是虚假的、伪造的，那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又从何谈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要“保守”住中国的古典文明。

顾先生引我走上治学之路

我于 1929 年春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 年秋在顾先生的影响下入该校历史系学习。当时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都是名家大师，比如 顾颉刚先生、傅斯年先生、钱穆先生、蒙文通先生、孟森先生、马衡先生，我都选过他们的课。进了大学后，研究入门很重要，不高明的老师，他本身就不会研究，更不会把金针度与人。但当时我们系的教授却能把治学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教给学生。在上述名教授中，顾先生对我影响最大。顾先生是指导我走入研究历史之门的第一位老师，后来也一直是我的指导老师，他的《古代历史》对我的影响很大。顾先生当时在北大开《尚书研究》，后来又转入《禹贡》的研究课，书中每一篇就讲一年，这样就把我们引导走向研究中国古史的路子。他不善言辞，重视教给学生正确的研究方法。每个星期他给每个学生布置了一道题，要他们做好。好多人不做，但我每次都做。他讲《尧典》时给我布置的题目是“共工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做题，以后就渐渐走上了研究轨道。顾先生又非常爱惜人才，热情提拔年轻人，这在当时的学术大师中也实为仅见。过去社会上有一种流言：“顾颉刚的文章都是学生们替他写的。”我听

了不禁哑然一笑，不值一驳。我认为在所有的历史学家中，只有顾先生的文章写得最好，他是史学家中的大文学家，文学家中的大史学家，没有任何人能写出他那种文风。那时我们一批学生刚大学毕业，懂得什么，能替顾先生写文章？相反，我们写的文章，往往要求顾先生签名，才能发表，得到的稿费也多，这是顾先生提拔年轻人的具体表现，决非占有青年学生的成果。因此，我对他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并且念念不忘：“终生感谢顾先生！”

与我同年同时入北京大学的同学中，何兹全、孙以悌、高去寻及晚一年入学的张政烺，后来都成为我的好友，现在他们（除孙早天外）都是有名的学者、人所共知的社会科学家。孙以悌先生少交游，业务水平在当时可以说是全校第一，许多人都知道他。我们不必到北大教务处去查，看有关傅斯年先生的《文物资料选辑》就可以知道。傅先生要在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中挑选优秀人才。去充实他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从那个选辑可知，以悌成绩全班最好，几门课都是 100 分，这在当时是少有的。还有，1937 年抗日战争后，我先去长沙联大，后来自长沙又去兰州，随顾颉刚先生在临洮、渊源一带办“中小学师资讲习班”，当时的教学老师十多人。其中有来自江苏无锡的王志梁老师。以悌也是无锡人，我就问志梁先生：“我有一个朋友孙以悌是无锡人，你认得吗？”志梁说：“认得，认得，我们是小学同学。他是天才，最聪明。当时有跳班制度，他一年跳两班！”一年跳两班”，也就是一年级学生，在年终就是三年级学生了。

1932 年初冬，以悌、我和同班同学高去寻兄（他后来在

台湾继傅孟真先生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北大红楼后操场“负喧”谈天。当时,正是日本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同学们正在火热地从事宣传抗日的活动。我们觉得,抗日要有实力,应当积蓄力量,以力量对付力量。于是我们打算成立一个读书小团体,钻研学术,开拓视野,以期加强我们的实力。但三个人太少,于是各提出一个候选人。去寻提胡厚宣,以悌提张政烺,我提王树民。当时张政烺和我尚不相识。读书会成立了,由以悌命名“潜社”,每星期六晚在我的宿舍开学术讨论会,因为我的房间只有我一人。

开会时讨论是热烈的,往往谈到夜 12 点,大家才散开。后来又决定出一本刊物,名“潜社史学论丛”,刊名由以悌去找马衡先生题写。第一期的文章有孙以悌:《书法小史》张政烺:《猎碣释文》杨向奎:《略论〈左传〉五十凡》等。这是一本学生刊物,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好的反响。郭沫若先生当时在日本也在研究石鼓文,看到张政烺兄的《猎碣释文》,曾来信和他讨论。我的《略论〈左传〉五十凡》也曾引起胡适之院长的注意,曾对我说:“看到了你的‘五十凡’。更引人注意的是以悌的《书法小史》在 60 年后的今天,一家出版社还打算作为书法书出版,虽然未能正式出版,我还是出资影印出来,以期在社会上流传,发挥汉字的美学价值。”

孙以悌的书法造诣极深,对古人的书法理论和实践多所发挥,对今人极具指导意义。他还善弈,有《围棋小史》一文载于《史学论丛》第 2 期,我也喜欢观弈。

以悌是一位天才，活下来，他会成为国学大师，或者是科学大师。因为他的数学、外语的水平，在本系也是头等。他的经济不宽裕，当时北大有奖学金制，各系优良学生可以得奖。他是历史系最好的学生，理应得奖，但那位系主任先生给了他的同乡。

以悌于 1934 年春蹈海而亡。蹈海原因，世人多不知，知其情者唯张苑峰（政烺）和我两人。我和以悌同年同班，都是 1931 年入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一开始就是好友。以悌孤僻，寡交游，但性格爽朗，并不是内向的人。我们虽是朋友，但治学方向并不相同，以悌喜欢“实学”，如“金石学”、“古历学”等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或实际文物。他虽然是一年级学生，在这方面的造诣已经是“专家水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我很喜欢比较空灵的理论研究，如顾颉刚先生的“尚书研究”、傅斯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以悌在他喜欢的课程上，考试都是 100 分。我在我所喜爱的课程上，成绩也比较优良。因为我们的治学方向不同，所以在许多学术问题上，看法不能一致。比如在他的《书法小史》中谈到“文字体变”时，他采纳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以为秦始皇后的“书同文”其文字是周秦系统。张政烺也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始至终反对这种说法，以为最先提倡“书同文”的是《管子》，接着《中庸》也谈“书同文”。统一文字是从齐鲁开始，东方文字已经统一后，才有秦始皇的统一文字。他下令焚诗书，并不是消灭已经统一的文字。即使在宗周时代，文化中心也在东方，而不是周秦。周秦文字和东方文字并没有根本歧异。现在《说文》中的“古

文”（东方文字）和“籀文”比较，没有根本不同，而古文更接近于甲骨、金文。《说文》中的 9000 多字，还是取材于古文系统的较多，不能说是周秦系统。

当时我和以 悌就有不同看法，现在与张政烺兄还是在争论中。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努力要说服他。在大学时，一到星期六的晚会上，我们也是经常吵闹不休，并不是“坐而论道”。

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这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现代的史学大师、经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
1. 学问自成体系；2. 形成一个独立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 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顾先生在这几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顾先生是著名的“古史辨派”的领头人物，这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记得他给我们讲经学，首先讲《尚书》。顾先生是今文学派的学者，他告诉我们《左传》是一部“假书”。我想，中学时代教务主任王先生说过《左传》是“假书”的话，曾使我不解。如今上了大学，像顾先生这样赫赫有名的学者，也说《左传》是“假书”，更使我不解。《左传》的真假问题在我心中已存放好多年了，我要追究下去。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我专门研究《左传》，看它到底假不假。三年级、四年级我陆续写了有关《左传》性质的文章，将毕业时，我又写了一篇《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一文，结论是《左传》不是假书，我要翻这个案，不同意今文学派的说法。1936 年在颉刚

先生主编的《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 2 期发表，居然得到好评。1937 年“七七”事变后，我到长沙。当时张政烺先生也在长沙，有一次他看《考古》杂志，在第 2 期上有一篇莫非斯先生的论文，谈到我的文章，评价很高，说这篇文章“精当绝伦”！当然没有那样好，但无论如何是为《左传》出了气，它不是“假书”。

《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一文分为导言、上编《论“左传”之性质》和下编《论“左传”与“国语”的关系》三部分。导言指出，《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与西汉政治紧密相连的。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 6 年）宗室刘歆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刘氏所建立者，除此书外，尚有《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等。经历代学者包括今人郭沫若先生的研究，《毛诗》已知其伪，今存《古文尚书》为伪中之伪，《周礼》为晚周时物，虽未能如今文家之判断为刘歆、王莽所伪作，然其非周公之作，则无疑意。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焚，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望者。故《左传》之真伪问题，实较他书为复杂。

当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时，即引起执政大臣及群儒之不满。今文经学家谓《周礼》伪自刘歆，以附成莽篡者，歆又遍伪群经以为佐证，而《左传》为其首要。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一书中，称刘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但为《左传》辩护者，自亦有人。东汉王充称《春秋》家“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

实”。晚近之刘师培、章炳麟诸古文家都盛赞《左传》。

上篇从《左传》书法及解经语《左传》凡例《左传》“君子曰”和《左传》古文论述了《左传》的性质。

今文家既谓《左氏传》不传《春秋》于是谓书法、凡例“君子曰”及缘《经》立说之语皆为后人之所窜加。本文则提出《左传》书法及缘经立说之语 46 条，均散见于《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西汉或稍前之书籍。《左传》之书法、凡例等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非出后人之窜加者。可见仅凭“窜入”二字，是不足服人之口而厌人之心。

关于《左传》凡例 经学家杜预在《春秋序》中谓：“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是谓《春秋》乃本周公之垂法而修。其中之义例，非仅史书旧章，亦经国常制。义例中，有所谓变例、凡例。《左传》之言“凡”，可分三类，若其言“书”、“不书”是为史官修史时之法则，今简谓之“史法”，凡例中属于此者共 9 条；若其言“曰”、“言”、“为”、“为”为修史时之属辞，今简谓之“书法”，凡例属于此者共 22 条；若其言“礼”、“言”、“常”是为通行礼论，今简谓之“礼经”，凡例属于此者共 19 条。凡例各类性质本非相同，礼经之类，谓为周公垂法，经国常制尚可。至于“凡例能左右之曰‘以’”、“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之类，不过一字之称，何能有当于国事？况弑君称君之类，岂真周公自定弑君之例乎？故谓周公垂法者，不待攻而自破矣。总之，《左传》之凡例与书法同来源，皆为《左传》原编者所随意加入者。这一结论足以攻